我国社区认同研究十年回顾与前瞻*

池丽萍[1]　**辛自强**[2]

（1. 中华女子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北京 100101；2.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872）

摘　要 社区认同是社区心理的核心要素，它被认为是包括社区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的二维结构。功能认同指居民对社区功能的满意和认可程度；情感认同指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联结与接纳。自社区认同二维结构及相应测量工具发布至今的十年间，我国各专业学者围绕社区认同的前因变量（包括居民和社区因素）与后果变量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存在理论建构不足、研究方法单一等局限。今后我们应从居民“需求满足”以及居民与社区“双向互嵌”的角度建构社区认同生成机制的理论，重视社区认同的历时性变化过程及其所受居民和社区层面因素的交互影响，从质性和量化角度考察社区认同的特点，推进基于证据的干预实验与基于地方知识的行动研究。

关键词 社区认同，邻里互动，社区参与，社区治理

1 引言

社区指生活在某个区域的、具有心理和精神关联的一群人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吴群刚, 孙志祥, 2011）。社区的形成有赖于共居一地的居民之间形成共同的心理，并产生对社区的认同。传统上，西方学者用“社区感”（sense of community）来指代这种社区共同心理，认为社区感由“成员资格”、“影响力”、“需要的整合与满足”以及“共同的情感联结”等四个要素组成（McMillan & Chavis, 1986）。同时，Chavis 等人（1986）编制了包括 44 个项目的“社区感测验”，这是第一个社区感量表。后来，有人将其简化为包含 12 个项目的“社区感指数”量表（Perkins et al, 1990），但对该量表因素结构的分析并没有证实社区感的四因素理论，而且该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存在明显不足（克隆巴赫系数为 0.07~0.72）（Chipuer & Pretty, 1999）；此外，该量表部分题目被指与地方依恋量表的题目雷同而使其内容效度也受到质疑（Long & Perkins, 2003）。于是，Long 和 Perkins（2003）将“社区感指数”量表修订为包含 8 个项目的“简明社区感指数”量表，其中包括相互关心、社会联结和社区价值观三个因素，这已根本不同于最初的四因素理论。由此可见，作为西方

收稿日期：2025-01-11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24BSH101）资助。

通信作者：辛自强, E-mail: xinziqiang@sohu.com

社区心理学基础概念的“社区感”，无论其理论构想还是测量工具都存在显著的不足。这可能因为社区感概念过于宽泛和复杂，以至于很难用某一工具进行测量；此外，“社区”类型的多样性也增加了测量的难度。

“社区”是个多样化的概念。在西方语境下，社区感研究者所测量的“社区”既包括街区、小区、村庄之类的“地域型社区”，又包括不涉及地域含义的“关系型社区”，即因共同目标或任务而形成的社团、组织等（道尔顿 等, 2010）。由于不同含义的社区在成因、性质上都有很大差别，必然会造成“社区感”一词含义的混乱以及测量结果的差异。在我国“社区”往往仅指“地域型社区”，其典型所指是城市里的小区或者“居民委员会辖区”，有时也涵盖村庄社区。因“社区”并不是一个文化等值的概念，所以我国的社区心理研究不适合简单套用西方的“社区感”概念。而国外个别研究者对社区认同的研究更关注地域型社区（Brodsky & Marx, 2001; Puddifoot, 1996），这种做法更符合我国社区的真实情况。鉴于此，我国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社区认同”（community identity）来特指居民对所居住社区的心理认同（陈福平, 李荣誉, 2019; 王艳丽 等, 2019;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郑建君, 刘静, 2021; 周骥腾, 2021; Fan, 2024; Wu et al., 2024），以避免概念和测量上的混乱。

虽然国外的社区认同研究起步比我国早，也提出了对社区认同内涵的界定，但这些定义的操作性不强，并不能支持相应工具的编制。最早关注社区认同的学者 Puddifoot（1995）将这一概念定义为居民对特定地理领域、长期居住地和家庭的归属感，并将其划分为“居民对社区生活质量的评估”、“居民对社区情感联结的感知”等 14 个维度。如此庞杂的维度区分，难以而且确实也未能产出有效的测量工具。另外，有的研究者简单套用测量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工具来考察社区认同，如 McNamara 等人（2013）关于社区认同的调查直接采用 Cameron 编制的测量社会认同的工具。虽然社区认同和社会认同存在着关联性，但是社区认同更强调对某个特定“地方”的认同感，而社会认同更强调对某个“群体”的认同感，二者明显有别，直接套用测量工具的做法并不合适。

目前，根据我国社区实际情况提出的社区认同概念、编制的本土工具已经广泛应用到实证研究中并被证实稳定、有效。本文主要以该领域的一些成熟测量工具为线索，搜集并总结我国社区认同的本土实证研究成果，分析未来如何在理论建构和方法创新方面实现突破。

2 社区认同的内涵与测量

鉴于当时国外社区心理学在社区感、社区认同的理论认识以及工具开发方面的明显短板，我国有研究者率先系统辨析了社区认同的内涵，并提出社区认同的二维结构（辛自强, 凌喜

欢, 2015）。他们认为，社区是一个居住地，其“地方”属性会让居民与这个地方产生情感联结和依恋，社区认同应该包括居民对社区情感方面的认同。社区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环境必然要满足人们生活的各项需求，为人们提供便利。那么社区的功能优劣（如交通是否便利、有无休憩环境等）一定会影响居民对社区的认同（Puddifoot, 1995, 1996）。由此，社区认同应该涵盖两个维度的内容：情感上的认同和功能上的认同。其中，“功能认同”指居民对社区功能的满意和认可程度，如对社区的便利程度、管理水平、环境条件以及社区能否满足家庭需求等方面的看法；“情感认同”是居民与社区的情感联结以及在情感层面上对社区的接纳，表现为居民是否在意他人对自己社区的看法，对于社区是否具有特殊情感，社区是否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否带来家一样的感觉。

基于以上社区认同二维结构的理论构想，研究者编制了社区认同量表（辛自强, 凌喜欢, 2015），量表共 8 个项目，分属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两个维度（表 1）。这是我国社区认同研究的第一个系统的本土测量工具，并被介绍到国外（Xin et al., 2017; Yang & Xin, 2016），后来也被国外研究者使用（Erol & Gormez, 2025）。

表 1 社区认同量表的题目与因子分析结果

题目	因子载荷		共同度
	功能认同	情感认同	
居住在这个社区，生活很便利。	0.73		0.63
我很认可这个社区的管理水平。	0.85		0.79
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社区环境条件令人满意。	0.88		0.80
居住在这个社区符合我们家庭的需求。	0.73		0.81
我居住的社区对我有特殊的情感意义。		0.76	0.76
我觉得这个社区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0.91	0.86
社区让我有家一样的感觉。		0.79	0.80
我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社区的看法。		0.79	0.66

注：引自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社区认同量表的各项心理测量学指标得到了充分检验。首先，它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辛自强和凌喜欢（2015）所做的因素分析显示（表 1），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两个因子能解释总变异的 76.21%。两因子各自包含的项目在相应因子上的载荷较高（都在 0.73 以上），且在另一因子上的载荷都较小（小于 0.30），项目和因子的隶属关系完全符合理论构想。每个项目上变异由两个因子解释的比率（共同度）都在 0.63 至 0.86 之间，两个因子解释了每个项目大部分的变异。其次，社区认同量表的可靠性也在实证研究中得到检验。在多项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基本都在 0.80 以上，甚至达到 0.93（陈福平, 李荣誉, 2019; 王艳丽, 宗凡誉, 王斌, 2023;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郑建君, 马璇, 2021; 郑建君, 刘静, 2021;

周骥腾, 2021; Erol & Gormez, 2025; Xin et al., 2017; Yang & Xin, 2016）。

目前，社区认同二维结构概念及相应量表在不同专业的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2015年至今，已有183篇中英文文献引用了这一社区认同概念，其中30余篇文献利用社区认同量表对我国城乡社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成果覆盖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管理、旅游管理、体育运动、人文地理学等不同学科和专业，涉及居民心理健康、社区治理、城市融入、乡村旅游与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发、工业区遗产社区改造与保护等多个主题。

2024年，公共管理领域研究者在社区认同二维结构的基础上，突出了社区的管理属性，编制了三个维度的城市社区认同量表（Fan, 2024）。量表共12 项题目，包括功能认同、治理认同和情感认同三个维度，分别作为社区认同的基础、保障和核心。功能认同与情感认同与前文社区认同量表（辛自强, 凌喜欢, 2015）含义相同，治理认同由对社区组织和工作的认可组成，它对社区认同起保障作用，即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工作团队的积极作为有助于建立并维持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一新编量表在原有二维结构基础上加以扩展，增加了治理认同维度以符合公共管理研究的需求，也被证明是一份有效工具（范洋洋,吕晓俊, 2025; Fan, 2024）。然而，该工具还有待同行的验证和应用。

我们以上述测量工具为线索检索各专业领域使用这些工具及其相应概念和理论的实证研究，从前因变量（居民特征和社区居住特征）与后果变量（心理和行为后果）两个方面系统梳理社区认同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整合矛盾性结果，抽取出规律性结论，并进行理论阐释。由于社区认同是一个主观变量，通常很难确认它与其他主观报告的变量之间究竟是谁预测谁，所以下文在综述过程中会更偏重总结那些客观测量的前因变量和行为类后果变量与社区认同的关系。

3 居民特征与社区居住特征对社区认同的影响

社区认同本质上是考察居民和社区的关系，所以多数研究都会将两者的特征作为社区认同的前因变量来考察。

3.1 居民特征对社区认同的影响

现有实证研究考察了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人口学特征以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心理与行为变量对社区认同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影响”大多只是表达一种关联性而非真正的因果关系，是出于表述方便的用法），但是很多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我们希望借助社区认同的二维结构挖掘出这些矛盾结果背后的解释逻辑，增进对有关研究成果的理解。

第一，性别。很多研究考察社区认同总分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但并未得到统一结论。社区认同无性别差异（陈婉姬 等, 2021; 吴文峰 等, 2024;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郑建君, 马璇, 2021）、女性认同程度高于男性（陈福平, 李荣誉, 2019; 王艳丽, 宗凡誉, 王斌, 2023; 郑建君, 刘静, 2021）、男性认同得分高于女性（梁晓伟 等, 2020）的观点都能找到数据支持。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些研究未关注总分差异是由社区认同的哪个维度贡献的。

已有研究指出，社区认同的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维度是相对独立的（辛自强, 凌喜欢, 2015），在某个维度上的高认同居民未必在另一个维度上也得高分。所以，以总分探讨性别差异可能会掩盖、歪曲、混淆性别的作用，导致研究结果相互矛盾。一项大样本调查证实社区认同两个维度的性别差异模式不同：在社区功能认同上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在情感认同上女性比男性得分显著更高（周骥腾, 2021; 周骥腾, 付堉琪, 2021）。此外，户籍、住房产权等可能会调节性别对社区认同的影响。例如，在租房和商品房群体中，男性的社区功能认同高于女性，而在回迁房和单位房居民中，女性情感认同显著高于男性（周骥腾, 2021）。可见，一方面要区分两个维度，它们一个是居住需求的指针，另一个则是情感联结的表现，不可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各种人口学或社区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也不容忽视。

第二，年龄。多数研究都支持居民年龄与其社区认同之间的正向关联，即年长居民的社区认同高于年轻居民（陈福平, 李荣誉, 2019; 陈婉姬 等, 2021; 王艳丽, 宗凡誉, 王斌, 2023; 梁晓伟 等, 2020;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周骥腾, 2021; Fan, 2024; Wang, Yang, Hu, & Chen, 2021; Wang, Yang, Zhang, & Hu, 2021）。但是，当采用社区认同的二维结构来分析时，年龄与两个维度的关系模式表现出差异：只有社区情感认同随居民年龄增长而升高，功能认同与年龄无关（周骥腾, 付堉琪, 2021;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Fan, 2024）。更有研究指出年龄对社区情感认同的正向预测可能是非线性的，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周骥腾, 付堉琪, 2021）。遗憾的是，该研究并未明确情感认同的拐点年龄是多少。 此外，有研究者指出 50 岁以上居民的社区治理认同得分和情感认同一样，均显著高于 50 岁以下居民（Fan, 2024）。可见，无论是与邻里还是社区管理或服务组织的情感联结似乎都与年龄有关。

我们可以用居民与社区的“双向互嵌”机制来解释年龄与社区情感认同的正向关联。年长居民可能在社区生活的更久，有更多重要生活事件、人际关系发生在社区中，因此社区更容易被纳入或嵌入到他们的生命历程中（Fleury-Bahi et al., 2008）。同时，年长者因居住时间长，也更多地卷入到社区事件中，对社区管理产生影响力，实现个体嵌入到社区发展史中。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之为居民与社区的“双向互嵌”。互嵌越深，居民的社区情感认同越高。

一项未发现年龄对社区认同影响的研究（吴洪翔, 2023）从反面支持了“双向互嵌”观点。该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入住社区时间较短（平均居住时长 3.22 年）的异地扶贫搬迁居民，搬迁后他们的生命历程、社会关系、生产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还未与现居社区发生充分的双向互嵌，他们的年龄不能预测其社区认同。

第三，受教育水平。不同受教育水平居民的社区认同是否有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调查样本的异质程度。以某街道或某社区的居民为样本开展的社区认同研究都倾向于得到“居民受教育水平不影响社区认同”的结论（如，王晓岑, 2016;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这类研究取样范围小，被试的受教育水平变异较小，可能不足以在分析中显示出社区认同的学历差异。学历以及与之相关的收入水平，本身可能构成了社区环境选择（买房或租房时的选择）的“门槛”机制，增加了同一社区内人群在学历和收入上的相似性，而减少了个体间的变异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取样范围较广（如跨街道、跨省市或全国范围内取样）的研究由于样本异质性高更容易得到“居民受教育水平会影响社区认同”的结果（如，陈婉姬 等, 2021; 王艳丽, 宗凡誉, 王斌, 2023; 郑建君, 刘静, 2021）。不过，受教育水平对社区认同的影响是正是负却仍无定论。这与研究仅以社区认同总分做指标，而未区分维度不无关系。

社区认同是一个二维结构，在维度层面分析或许可以减少矛盾结果。研究者发现居民受教育水平对社区认同两个维度的预测模式不同：受教育年限能正向预测社区功能认同，而无法预测情感认同（周骥腾, 付堉琪, 2021）。另一项全国调查按照社区认同二维结构得分将被试聚类为强认同型（情感和功能认同得分均较高）、情感认同主导型（情感认同高、功能认同低）、功能认同主导型（功能认同高、情感认同低）和弱认同型（两类认同均低）四个亚群体，发现情感认同主导型居民更可能是居住在农村、受教育水平更低、经济收入较低的人群（Wang et al., 2022）。这些人没有条件入住硬件资源和管理服务更好的、能够满足生活需求的社区，其对社区的功能认同较低，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对邻里和村社的情感依恋。虽然情感认同主导型和功能认同主导型居民的社区认同总分差异不大，但是他们认同的是社区的不同方面。

第四，收入水平。与受教育水平因素类似，居民收入与社区认同是否相关很大程度上也受样本异质性影响。对城市社区居民的研究大多未发现社区认同与收入水平之间稳定的关联（陈福平, 李荣誉, 2019;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吴文峰 等, 2024; 周骥腾, 付堉琪, 2021; 周骥腾, 2021）。而两项样本异质性较高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居民收入越高，社区认同总分越高（梁晓伟 等, 2020; 郑建君, 刘静, 2021）。遗憾的是，两项研究均未区分社区功能认同与情感认同，因此今后要具体到维度层面报告结果。或许收入高低体现的是居民居住社区

的功能强弱，那些高收入者更可能居住在功能完善、能满足家庭需求的社区中，其社区功能认同水平更高。要探测到这种差异，在取样时要增加社区的变异性，分离收入这类个体特征与社区特征各自的主效应与跨层交互作用。

第五，户籍。户籍通常在研究中被用来区分城市和农村居民（非农和农业户籍）、本地和外地居民。研究者对比了农业和非农户籍（基本对应了居住地在农村和城市）居民所属的社区认同类型，发现农业户籍（通常收入也较低）的居民更多属于社区情感认同较高而功能认同较低的亚群（Wang et al., 2022）。这再次揭示了社区认同两个维度的形成机制差异：情感认同源自居民与社区的双向互嵌，功能认同取决于需求满足。农村是传统的熟人社会，邻里间甚至可能存在血缘、亲缘关系，居民与社区的双向互嵌很深，其情感认同较强；但农村居住条件差，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能力不高，对其功能认同较弱。对流动人口聚集社区的研究用户籍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发现本地户籍居民的社区认同总分更高（梁晓伟 等, 2020），尤其是情感认同得分显著高于外来流动人口（汪丽 等, 2021）。调查数据及访谈结果均显示本地户籍人口在社区的居住年限更长，双向互嵌更深，因此社区情感认同更强。

综上，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户籍会对社区认同产生一定影响，且其对社区功能认同、情感认同的影响模式往往不同。此外，居民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职业类型等也被少数研究者作为社区认同的影响因素，但并未发现这些变量与社区认同间存在稳定可靠的关联（陈福平, 李荣誉, 2019; 王艳丽, 宗凡誉, 王斌, 2023; 郑建君, 刘静, 2021）。

除人口学变量外，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相关的心理变量（如社区责任感、社区治理期望等）、社区参与等也被作为社区认同的前因变量考察。首先，社会经济地位。有研究者对比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由学历、收入和职业合成）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由被试在10级量表上自我评分）与社区认同的关系，发现只有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认同总分存在显著相关，并能在统计上正向预测社区认同，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认同无关（Wang, Yang, Hu, & Chen, 2021）。这项研究没有表现出学历、收入的“门槛”机制，我们猜测与社区认同未能区分出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两个维度有关。另有研究（Wang et al., 2023）通过资源可得性任务操纵主观社会阶层，发现被操作为低社会阶层的居民社区认同水平也较低。

其次，与社区有关的心理变量。社区责任感、共同体意识、社区治理期望、治理绩效感知、感知到的绩效与期望的差异等变量都反映了居民对社区事务（如福祉、公共参与、治理状况）的感知或观念，它们能够正向预测社区认同总分（范洋洋, 吕晓俊, 2025; 刘文佳, 2022; Yang et al., 2020）。然而，这些横断研究所探讨的是主观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设定预测

方向的过程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本质上还是一种粗略的相关分析而已。

最后，社区参与。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追踪研究发现，居民搬迁后的社区参与行为能够预测其社区认同总分，进而解释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即社区参与可以借助社区认同作为“桥梁”促进搬迁户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吴文峰 等, 2024）。参与社区活动或加入社区组织是居民对社区产生影响、嵌入社区的重要路径，其提升社区认同的作用被多项研究证实（梁晓伟 等, 2020; 刘文佳, 2022; Deng et al., 2024）。需要指出的是，社区参与促进社区认同的过程，或许只是二者双向因果关系的一个侧面，下文会论证相反的过程也在发生。

3.2 社区居住特征对社区认同的影响

在社区认同研究中，社区居住特征主要以居住时长、居住类型、社区环境、空间特征以及治理特征为测量指标。有关研究所得结论或许有异，但对矛盾结果的对比和梳理却凸显了社区认同二维结构应用于实证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一，居住时长。在考察居住时长与社区认同的关系时，若以社区认同总分为因变量，研究者们得到的结果不甚一致：有发现居住时长正向预测社区认同的(陈福平, 李荣誉, 2019; 梁晓伟 等, 2020;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也有认为两者无关的（王永桂, 2017）。但是，当区分了社区情感认同和功能认同时，研究者们得到了一致结论：居住时长只能正向预测情感认同，而与功能认同无关（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周骥腾, 2021; 周骥腾, 付堉琪, 2021）。Fan（2024）的研究比较了在社区居住时间小于 5 年、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三组居民社区认同不同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发现居住时间小于 5 年的居民社区功能认同得分高于情感认同，居住 10 年以上的居民情感认同高于功能认同，而治理认同因为既与社区服务有关（有功能含义），又涉及到与工作人员的人际交往（有情感链接），所以得分介于二者之间。居住时长与前文提及的居民年龄、户籍（影响居住时长）都是体现“时间”属性的变量，它们能稳定地预测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居住时间越长、年龄越大、有本地户籍（可能长期居住此地）的居民与社区的“双向互嵌”越深，对社区的情感认同也越强。

第二，居住类型。居住类型在具体研究中的操作定义非常多样，包括住房产权、社区性质、居住地类型等多种测量指标。例如，调查结果显示商品房居民的社区认同高于回迁房和老城区居民（陈福平, 李荣誉, 2019），居住在农村、乡镇、县城、城市的居民对居住社区的认同感总分依次升高（郑建君, 刘静, 2021）。但这两项研究未区分情感认同和功能认同，我们并不知晓出现认同差异的是哪个维度。当区分考察时，居住类型对社区情感认同和功能认同的影响表现出规律性的差异：那些基于市场规则选择居住社区的人（租房、商品房群体）对社区的功能认同更高，情感认同相对较低；而因地缘或业缘关系入住社区的人（回迁房、

单位房群体）对社区的情感认同更高，功能认同较低（周骥腾, 2021）。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对社区认同两个维度不同形成机制的观点：功能认同源自“需求满足”，情感认同来自居民和社区的“双向互嵌”。

第三，社区环境设置。研究发现社区不同的环境设置对社区认同影响的路径有差异：社区内是否有足够的绿地会对居民的心流体验产生影响；而建筑和道路设施的规划可能会“型塑”居民人际交往，从而影响居民的社区认同（Mao et al., 2022）。可见，社区物理环境既可以通过满足居民需求（如，放松身心、通行便利）来增强其社区功能认同，又能以提供互动平台的方式助推居民构建社区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增加其社区嵌入程度，提升社区情感认同。地方依恋的研究甚至提出，社区仅提供一片空地供居民每天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如锻炼、聊天、晒太阳）就有助于社区嵌入到居民的自我系统中（池丽萍, 2019）。若居民的活动吸引了邻里或得到社区支持，那么居民嵌入社区就发生了。此外，一项对工业遗产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研究显示，工业用地转型过程中对产业园区的过度改造破坏了原产业园区的工人与产业园区之间的双向互嵌，导致他们与社区、园区出现情感隔离，削弱了其社区情感认同；同时，改造后的园区与原工人住宅区在物理空间上的隔离以及功能上的隔离都让社区居民的生存境况恶化，降低了其社区功能认同（孙淑亭 等, 2022）。

第四，社区空间设计。土耳其学者比较了不同空间设计如何通过社区感影响邻里关系（Erol & Gormez, 2025）。他们发现单户住宅区在促进社交互动、社区认同和归属感方面更具优势，而公寓式住宅小区仅在归属感方面有一定作用。在当地单户住宅区居民价值观更接近，且基本拥有房屋产权（可能居住时间更长），其与邻里之间的交往更多，可能与社区的双向互嵌也更深，因此表现出更强烈的社区认同。而公寓式住宅小区的居民相对更“原子化”（可能流动性也较强），邻里交往较少，与社区的互嵌较浅，所以社区认同更弱。

第五，社区情感治理。情感治理指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理念，通过干预社区情感再生产过程，重构居民内部以及居民与社区工作者的人际互动关系，从而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实现治理目标的方式。可见，这种柔性治理方式有意识地增加了居民与社区的双向互嵌，以此提升居民的社区情感认同。研究者通过对上海 52 个社区中的 854 名居民的问卷调查考察了情感治理实践是否会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结果显示社区情感治理程度越高，其居民的社区认同水平也越高（范洋洋, 吕晓俊, 2025）。该研究在数据分析中没有区分社区认同的维度，我们猜测情感治理对社区情感认同和治理认同的预测作用应大于对功能认同的作用。

总之，居民特征和居住特征单独或交互影响着居民的社区认同，虽然每个或每类变量的

影响需要具体分析，但是所有社区认同前因变量的影响呈现出相似的底层逻辑：社区功能认同的强弱更多取决于社区软硬件条件是否满足居民生活需求，而情感认同得分高低受居民和社区“双向互嵌”程度影响。

4 社区认同的心理与行为后果

社区认同一旦形成，必然会对社区心理的其他变量（暂称为“近端变量”），如邻里互动、社区参与、社区心理所有权、社区文化认同等产生影响；此外，它也可能影响人们更广泛的“远端”心理与行为变量，如控制感、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利他行为、政治心理与行为。

4.1 近端后果变量

第一，邻里互动和邻里关系。邻里互动、邻里关系或邻里互助都被研究者用来反映居民与同社区邻居的交往程度与关系状况，它们都与社区认同存在密切关联。多个研究发现社区认同与邻里互动存在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39到0.51之间（梁晓伟 等, 2020;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周骥腾, 付堉琪, 2021; Shi et al., 2022）。一项社区实验研究区分了社区认同的两个维度，考察它们对居民的邻里助人意愿影响是否相同，结果显示，只有社区情感认同能够正向预测居民对邻里的助人意愿，社区功能认同的预测作用不显著（Yang & Xin, 2016）。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已经成为居民互动的重要平台，部分弥补了城市社区（尤其是商品房社区）居民因彼此陌生或忙于工作而无法实现线下互动的不足。调查发现，居民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与邻居交流能够提升他们的社区认同（陈福平, 李荣誉, 2019）。利用社区认同二维结构进行的分析显示，居民的线上交往行为只能正向预测其社区情感认同，却无法预测其功能认同（周骥腾, 付堉琪, 2021）。这个结果与线下邻里交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线上和线下邻里交往是实现居民与社区双向互嵌的重要载体之一。但是虚拟社区中的互动是如何促进双向互嵌发生的，尤其是线上互动实现社区内嵌到个体生命历程的机制，仍有待未来研究来解答。

第二，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指居民对社区活动和事务的参与程度。大量研究都发现社区认同不仅能够正向预测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更是与居民实际参与社区管理事务的情况（如，参加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活动和会议、向物业部门反映问题、在社区公共场合表达看法和意见等）存在显著正相关，不同研究得到的相关系数在0.22到0.53之间（陈婉姬 等, 2021; 梁晓伟 等, 2020; 潘孝富 等, 2022; 吴文峰 等, 2024;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Deng et al., 2024; Shi et al., 2022; Xin et al., 2017）。进一步的分析指出，社区认同两个维度均与社区参

与各指标显著相关（潘孝富 等, 2022;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Wang et al., 2022），且只有社区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得分都较高的居民才可能有更高的社区参与意愿和行为（Wang et al., 2022）。可见，社区认同的两个维度与社区参与的关系相似。

除了能够线性预测社区参与之外，社区认同还被发现能够充当调节变量，扭转外出务工这类与原生村社“脱嵌”的劣势状态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方向。李芬妮等人（2020）对湖北千余名农户的调查发现，虽然外出务工对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参与存在消极影响，但是对村庄认同程度不同的外出务工农户在这项事务的参与上表现出差异。随着农户的村庄认同增强，外出务工经历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消极作用逐渐减弱，正向作用开始显现，尤其是当农户的村庄认同度超过门槛值时，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将由负转正，即村庄认同在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上可以发挥“扭转乾坤”之效。虽然该研究并未区分社区认同的两个维度，但是可以推测，正是出于对村庄的强烈情感联系，外出务工农户才更有热情参与到改善社区功能的事务中。

第三，社区心理所有权。社区心理所有权指居民将社区及相关对象物视为自我的态度倾向，在实证研究中用“我感到社区的一草一木都是属于我或我们的”等项目来测量（潘孝富 等, 2022）。可见，社区心理所有权本质上体现了居民的社区主体意识和对社区的控制感，是社区嵌入居民自我系统的表现形式之一，理应与社区情感认同存在显著正相关。实证研究确证了两者存在高相关（r=0.74），而社区心理所有权与功能认同的相关稍低（r=0.58）（潘孝富 等, 2022）。

第四，社区文化认同。一项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居民的研究发现居民社区认同水平越高，对社区所依附的文化认同也越强烈，这种文化认同的表现已经超越了他们对居住环境、邻里的归属和依恋（王永桂, 2017）。可见，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可能不仅体现在对社区物理环境、管理与服务的满意，对邻里和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联系，可能还包括对社区文化或精神环境的认同和归属。

上述变量除了作为社区认同的近端后果变量外，有时也会被当做社区认同的前因变量（如梁晓伟 等, 2020; 吴文峰 等, 2024; Deng et al., 2024）。于是，有研究者提出社区认同、邻里互动和社区参与等是相互影响的社区心理变量，可共同作为社区治理或社区融合的测量指标（如陈福平, 李荣誉, 2019; 周骥腾, 付堉琪, 2021）。可见，这些近端后果变量与社区认同均属于社区心理变量，社区认同是其中的核心要素（辛自强, 2016），它会单独或与其他社区心理变量对远端后果变量产生重要影响。

4.2 远端后果变量

社区认同作为一种心理资源，能够为居民提供内在的归属感，从而对其远端心理变量（如积极情感、利他行为、政治心理与行为等）产生积极影响。这些研究没有特别区分社区认同的两个维度，而将社区认同看做社区心理变量的核心，认为较高的社区认同能够满足居民归属、爱与尊重等心理需要，促进各种积极情感和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第一，控制感、被他人接受、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积极情感体验。研究显示社区认同能够正向预测居民的控制感（王艳丽, 胡小勇, 王康, 2023; Wang, Yang, Hu, & Chen, 2021），即在社区中需求能够被满足，与社区存在情感关联都可能让人产生掌控感和效能感。对搬迁移民的纵向追踪研究发现，被他人接纳与社区认同、社区认同与生活满意度在交叉路径上相互预测，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关系（Wu et al., 2024）。这表明被他人接纳程度高的搬迁居民，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温暖和支持，可能促进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形成良性循环；较高的社区认同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认同的增强可能会进一步促进居民被他人接纳，而被他人接纳程度的提高又会反过来强化社区认同，共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社区认同与生活满意度存在相关（辛自强, 凌喜欢, 2015），且社区认同总分能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吴文峰 等, 2024; Wang, Yang, Zhang, & Hu, 2021）和主观幸福感（王艳丽, 胡小勇, 王康, 2023; 王艳丽, 宗凡誉, 王斌, 2023　Deng et al., 2024）。很遗憾，这些研究都未区分考察社区认同的两个维度与众多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否有差异，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和分析社区认同与这些后果变量发生关联的本质。

第二，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社区认同不仅能预测居民对邻里的助人意愿（Yang & Xin, 2016），它还能正向预测居民对邻里之外的一般他人的亲社会行为倾向（Yang et al., 2020）。有研究发现社区认同在社会经济地位和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Wang, Yang, Hu, & Chen, 2021）。这意味着那些地位较低的居民更可能生活在较差的社区环境中，缺少与邻里的情感联系，需求未必能满足，故而社区认同较低，最终让他们没机会习得和表达亲社会行为或利他行为。

第三，对政治心理与行为的影响。研究者考察了社区认同对公民参与、政府信任、政治信任的影响，发现社区认同能够正向预测这些政治心理与行为，即公民对所居住社区的认同有助于激活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参与热情与行动，而这些参与实践可能进一步将社区认同转化为对政治系统各构件的信任（郑建君, 刘静, 2021; 郑建君, 马璇, 2021）。

5 社区认同研究的展望

目前，我国社区认同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两个本土测量工具，但是鉴于城市社区认同量表（Fan, 2024）提出时间较短，应用较少，下文的讨论仍主要以社区认同二维结构概念及相应量表（辛自强, 凌喜欢, 2015）为主。该量表开发并投入使用已有十年，我国社区认同的本土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也存在遗憾与不足。首先，理论建设不足。以往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定量分析结果，这有助于我们归纳出社区认同的共性规律，发现二维结构的合理性，但在社区认同二维结构的发生机制上却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建设。其次，对社区层面因素影响的研究匮乏。学者们从个体层面充分挖掘了居民人口学特征、居住时长等社区认同的前因变量，却相对忽视了对社区层面前因变量的研究，尤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为甚。再次，缺少历时性研究视角。大量横断设计的调查研究虽然呈现出社区认同与前因、后果变量的静态关系，但却不能回答这些关系是如何发生、演化的。再次，研究方法单一。目前的社区认同研究大多通过调查法收集数据，借助量化分析技术描述变量关系或解释结果变量的变异，而不大重视对相关文本资料、图形信息的利用。这种方法取向可能导致对异质性群体的忽视，人为割裂了社区与其所处社会时空背景的关联。最后，缺少干预研究。当前的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变量关系的现状描述上，基于这些实证结果的干预研究非常罕见。因此，未来在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思路上均有可提升空间。

5.1 建构社区认同生成的“需求满足”与“双向互嵌”机制理论

社区认同二维结构的合理性已被证实：社区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相互独立，两者的内涵、影响因素、生成机制等均不相同，甚至泾渭分明。社区功能认同指居民对社区功能的满意和认可程度。它本质上是衡量社区功能强弱的指标。通常入住功能完善、能满足个人和家庭所需的社区是有“门槛”的，社区类型或房屋产权、学历以及与之相关的收入水平共同构成了社区功能选择的“门槛”。那些高收入、高学历者能够按照自身居住需求选择功能完备的城市商品房社区，因此其社区功能认同感较高；而功能认同得分低的居民未能达到入住高功能社区的“门槛”，其需求未能被所居住社区满足。可见，社区功能认同的“需求满足”决定了居民与社区之间存在利益关联。

社区情感认同指居民在情感层面对社区的接纳和认可以及与社区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来自居民和社区的“双向互嵌”。社会学者将社区认同与居民参与的循环互构称作社区嵌入机制（颜玉凡, 叶南客, 2019），主要强调居民通过邻里互动和社区参与嵌入到社区中，提升其社区认同。与此不同，我们认为社区情感认同的生成遵循居民与社区的“双向互嵌”机制——同时关注“社区嵌入个体生命历程”和“个体嵌入社区网络”。一方面，社区可能是居民重要生活事件（如上学、交友、结婚等）和人际关系发生的背景和不可剥离的成分，

被纳入到其生命历程中；另一方面，居民在邻里互动和社区参与中不断嵌入到社区网络中。“双向互嵌”需要时间，因此，那些能体现时间属性的变量（如居民的年龄、居住时长、户籍等）都能够预测居民社区情感认同。

在本文中，我们尝试性地提出社区认同的“需求满足”和“双向互嵌”机制，这一理论观点不仅有待进一步检验，而且由此衍生出一些新的研究议题。第一，“双向互嵌”和“需求满足”表现为居民个体层面与社区层面变量的关联性，两者如何影响社区认同。第二，“互嵌”不是一次完成的，有时间维度，居民“需求满足”可能是居民与社区长期博弈的结果，那么个体的时间变量（如年龄、时期、世代演化）、社区时间变量（如社区生命史、社区事件演化等）如何影响社区认同的历时性演化。第三，“互嵌”不仅表达为量的关系，还体现在共享意义的生成，以及“门槛”对意义生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第四，“互嵌”是行动者改变环境的过程，包括用行动破解“门槛”机制，通过社区参与提升社区功能，促进社区认同。

5.2 从个体层面与社区层面探讨社区认同的影响因素

社区认同研究应该采用人与社区互构的系统观点，同时从居民个体层面与社区层面完整探讨社区认同的影响因素。目前多数社区认同研究仅从居民个体层面分析社区认同的前因变量，忽略了社区层面变量的收集和分析。未来研究可借用多层线性模型探究两层面变量各自如何影响社区认同，以及如何交互影响社区认同。

目前只有少数研究以社区为分析单位，考察社区层面变量对社区认同的影响。例如，一项对上海市 546 个小区的调查以小区为单位收集了社区管理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的工作情况与居民社区认同数据，分析发现：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三个治理主体的工作状况都与居民社区认同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且居民委员会工作能力会改变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的矛盾对居民社区认同的影响。当居民委员会工作能力较强时，两个委员会的矛盾对居民的社区认同影响不大；而当居民委员会工作能力较弱时，其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融洽则居民的社区认同较高，若关系不融洽，小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会大大降低（马丹, 袁浩, 2018）。

还有研究者同时在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收集了居民媒体资源使用情况，以评估哪类媒体资源能提升社区治理水平（陈福平, 李荣誉, 2019）。该研究收集了 22 个社区的“官方”新媒体平台建设情况（社区层面的变量），以及这些社区中居民们使用微信、QQ 群、微博等“民间”媒体资源的情况（个体层面的变量），考察居民上述两类媒体资源的使用是否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社区认同为其中一个指标）。结果发现：居民感受到的社区治理水平提升

主要源自微信等“民间”媒体的贡献，“官方”正式平台贡献不大；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官方”平台收效不佳的根源并非社区的互联网平台运营技术和能力欠佳，而是官方平台发布的信息内容过于行政化、平台的内容生产和居民的需求脱节。

5.3 从个体和社区时间尺度上考察社区认同的历时性演化

横断设计只能呈现社区认同与其他变量的静态关系，而采用动态视角的历时性研究能够在居民和社区的不同时间尺度上，揭示社区认同的产生、发展以及削弱的过程，也能考察社区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

第一，考察居民个体时间尺度上社区认同的演化过程。居民的个体时间尺度除了当前研究关注的居民年龄、居住时长外，还包括调查时期（period）和世代（cohort）。通过对社区居民进行多轮次的数据收集，可以构建一个连续的独立样本设计，从而可分离出居民年龄、居住时长、调查时期和世代的作用。例如，通过整合不同时间尺度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识别出老年居民社区认同感较高的成因：有年龄、居住时长带来的深度“双向互嵌”（辛自强, 2015;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有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这类特殊时期或特殊事件的影响（Wang et al., 2022），可能还有出生组效应即世代的影响（唐有财, 胡兵, 2016）。

第二，考察社区时间尺度上社区认同的历时性演化。社区的时间尺度包括社区建造、使用和改造的历史、社区关键事件的演化过程等。例如，追踪某社区从社区楼盘规划、建成验房、各家装修、入住生活过程中居民如何因维护共同利益而相识、聚集，又如何从陌生人变成社区中的各种“搭子”，乃至朋友。社区关键事件通常发生在涉及社区所有居民利益的公共议题中，如由老旧小区居民分摊费用加装电梯、与开发商谈判维权等。它能让原子化生存的家庭和居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而彼此信任、相互合作。这就是社区与居民的双向互嵌快速发生的过程。考察这些关键事件和更大时间尺度上的社区发展历史对社区认同的影响需要追踪研究。

第三，考察社区认同与其他变量的动态因果关系。在横断设计的社区认同研究中，邻里互动和社区参与有时被作为社区认同的后果变量，但有时又被作为前因变量。当加入时间维度开展追踪研究时，我们可能发现三者在居民与社区的双向互嵌过程中循环互构：居民与社区、邻里发生的关联被纳入到居民的个体生活史中，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即社区嵌入到个体中），产生社区认同；同时，社区认同促使个体更多地参与社区活动、融入邻里关系，甚至逐渐改变和重塑社区生态，使个体嵌入社区网络之中，从而进一步再生产了社区认同。因此，它们之间会表现出互为因果。一项对社区志愿者的追踪研究证实了存在三个变量循环互构实现社区认同再生产的过程。该研究发现那些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就乐于为社区服务的社区志愿

者与受助居民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其社区认同也较高；这种高社区认同会在后续疫情爆发期间增加其参与社区抗疫志愿活动的概率（Wakefield et al., 2022）。

5.4 从质性和量化不同角度阐明社区认同的特点

对社区认同的研究在方法上应发挥质性和量化研究的优势，从不同角度考察和阐释社区认同的特点。量化研究既要揭示社区认同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又要考察这种关系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表达。同时，不应排斥质性研究的独特方法和视角，重视质性研究在假设检验和理论建构中的作用。

第一，量化研究中适当补充个体指向的分析。多数社区认同研究采用变量指向（variable-oriented）方法，注重挖掘可被用于总体的共性规律，但这种分析忽略了社区和人群的异质性。个体指向（person-oriented）的分析承认社区和居民群体的多样性，旨在识别被社区认同变量的关联模式描述的各类亚组（杨之旭, 辛自强, 2016）。Wang 等人（2022）利用潜在剖面分析识别出社区认同的亚组及其占比：强认同型（占 43.7%）、功能认同主导型（占 25.0%）、情感认同主导型（占 19.8%）和弱认同型（占 11.5%），并描述了不同亚组居民的人口学特征画像，比较了各亚组居民的社区参与水平，这为社区动员和精准社区干预提供了依据。

第二，重视质性研究方法的使用。首先，综合使用观察、访谈、线上数据抓取等多种方法收集研究资料。例如，有研究为了评估“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的实施效果，综合利用了居民问卷调查、对社区管理者和信息平台运营方的深度访谈，以及线上抓取到的平台信息使用情况等多类型方法，客观、全面描述了互联网助力社区治理的现状（陈福平, 李荣誉, 2019）。其次，利用档案资料、政策文件、地理信息多品类研究资料，立体呈现社区认同形成的背景。例如，一项工业遗产社区改造与社区认同关系的研究将相关的遗产保护文件、物理环境的实地勘测结果、社区改造前后的地形图等纳入分析（孙淑亭 等, 2022）。最后，利用案例研究支撑理论思考。社区认同研究在强调大样本和普适性结果的同时，也需要重视案例研究。案例研究通过对事件过程、人群互动、环境变化等的详细描述有助于研究者做深层理论思考。例如，有学者追踪了上海市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事件的始末，通过访谈深度描述小区居民如何在一次次利益冲突化解中让社区逐渐从缺少邻里交往的原子化状态成为利益、治理、情感三重共同体，并提出社区空间生产包括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情感空间三重生产过程，三重空间的生产彼此交织，助推社区认同的产生（吕俊延 等, 2024）。

5.5 推进“基于证据”的干预实验与基于地方知识的行动研究

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这两个维度的区分为社区认同现状描述、问题诊断、干预方案制定

提供了指标和框架。近十年的社区认同研究已在实证证据方面有了足够积累，到了将其做实践转化的时机。未来应采用实验和实践思维，着力推进“基于证据”的干预实验、基于地方知识的行动研究，以社区认同培育为切入口扎实推进社区心理建设。目前的社区管理或治理实践，重制度而轻“人因”，重行政管制而轻心理建设（辛自强, 2016）。层级化的社区治理结构产出的治理行为通常在耗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情况下未必能符合居民需求（陈福平, 李荣誉, 2019），可能还削弱了居民之间的横向联结，阻碍了居民心理共同体的形成。社区心理建设关心“人因”和“心理建设”，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对社区事务的关心和参与作为社区建设的“心理目标”（兰艺华, 辛自强, 2020）。社区认同的干预实验和行动研究就是社区心理建设的现实抓手。

第一，加强“基于证据”的干预实验。基于社区认同二维结构的实证研究提示社区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可能不“同步”，两者的形成机制不同，干预策略也应不同。以增进社区情感认同为例，以往研究发现商品房居民、流动人口的社区情感认同较弱，我们可以用“双向互嵌”不足来解释这个现象，但是对于入住时间短、流动性强的居民来说仅靠“时间”力量被动增加互嵌程度并无助于解决当下的低认同问题。Xin 等（2017）找到了影响居民“嵌入”感知的核心心理变量——“自我构念”，来提升居民对社区嵌入的感知，并尝试将其操作化为社区工作者可实施的工作举措。他们的研究发现居民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看法（即自我构念）会影响其社区认同。自我构念分为独立型自我构念（关注自我，与他人保持独立）和互依型自我构念（强调关注他人，把自己嵌入到社交角色和关系中）两种，人们可能同时拥有这两种自我构念，只是水平高低各有不同。那些高互依型自我构念的居民比其他人表现出更高的社区情感认同。在研究中，被成功启动了互依型自我构念的居民比被启动独立型自我构念的居民表现出更高的社区情感认同，也更愿意参与社区事务（Xin et al., 2017）。研究者据此提出可以在社区中张贴以“我们”为主语的标语和宣传，印制体现共同体的文化衫、标志牌，启动居民相互依存的归属感，提升社区情感认同。此外，研究者们还提出增加本社区与其他社区在文体活动、卫生评比等方面的友好竞争，有助于加强居民对本社区的“内群体”认同，提升其社区认同（兰艺华, 辛自强, 2020）。

第二，开展基于地方知识的行动研究。一般的社区认同实证研究过程通常是由研究者单向设定的。在整个过程中居民（即研究的“被试”——被动地接受研究）只是数据提供者，不知晓研究结果，研究结果也并不能直接应用于被试所在社区的治理实践。而社区认同的行动研究则直接将社区作为研究现场，研究问题直接来源于社区治理的“痛点”，研究目的就是有效解决这些来自社区情境中的真实问题。因此，居民、社区工作者（研究问题涉及的人

员）作为“行动者”全程参与研究，与研究者共同讨论、确定或修改研究问题、行动方案并实施行动、评估结果，最终解决问题。整个研究过程即是解决社区问题的治理过程。由于在行动研究中居民或社区工作者能够全程主动参与，他们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被激发，研究所引发的变革通常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甚至直接成为社区治理的成功举措。例如，曲映蓓和辛自强（2017）在社区中利用“影像发声”技术开展的行动研究就是通过引导居民对自家或小区内的垃圾分类情境做影像拍摄，组织居民就影像展开讨论，引导居民自己发现问题、集体讨论确立共同目标和任务、一起制定工作方案并付诸行动，从而部分解决了社区垃圾分类宣传和推广难题，同时也提高了居民们的社区认同。

6 小结

社区是居民的栖居之所，更应是居民建立在共同心理基础上有机团结的生活共同体。社区认同则是这种共同心理的核心，也应是社区心理建设的核心（辛自强, 2016, 2020）。以国内学者（辛自强, 凌喜欢, 2015）提出的社区认同概念和相应测量工具为基础，我国对社区认同开展了历时十年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方法论都有待继续深化。展望未来，在内容上我们应该系统探讨社区认同与各种前因和后果变量的关系，重点揭示社区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的不同生成机制及其作用机理，并加强相关理论建构。在方法和思路上，今后的社会认同研究应该采用人与社区互构的系统观点，同时从居民个体层面与社区层面完整探讨社区认同的影响因素；应该采用动态视角，在居民个体时间尺度（如年龄、居住时间、世代演化）以及社区时间尺度上（如社区建造、使用和改造的历史、社区关键事件的演化过程）考察社区认同的历时性演化以及与其他变量的动态因果关系；应该从质性和量化等不同角度阐明社区认同特点，既要揭示社区认同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又要考察这种关系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表达；应该采用实验和实践思维，着力推进“基于证据”的干预实验、基于地方知识的行动研究，以社区认同培育为切入口扎实推进社区心理建设。

参考文献

陈福平, 李荣誉. (2019). 见“微”知著:社区治理中的新媒体. *社会学研究*, (3), 170–193+245.

陈婉姬, 李莹, 宿湘林, 刘雨飞, 刘懿璇. (2021). 公众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科普研究*, (2), 59–67+110.

池丽萍. (2019). 城市社区中儿童友好环境的营造. 人权, (6), 41–57.

道尔顿, J. H., 伊莱亚斯, M. J., 万德斯曼, A. (2010). *社区心理学: 联结个体和社区*. (王广新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范洋洋,吕晓俊. (2025). 情感治理何以提升居民认同?——基于期望失验模型的解释. *公共管理评论*, (1), 34–56.

李芬妮, 张俊飚, 何可. (2020). 农户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30*(12), 185–192.
兰艺华, 辛自强. (2020). 促进社区共享共治的心理学思维与路径. *社会治理*, (1), 65–69.
梁晓伟, 兰佳豪, 吴碧君. (2020). 城市多民族社区的社区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都市武侯区蜀汉街社区的调查.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 (5), 90–96.
刘文佳. (2022). 新市民社区认同问题及共同体意识的中介效应研究——基于广东省 H 区的实证调查. *探求*, (5), 41–50.
吕俊延, 甘甜, 叶岚. (2024). 重建"附近": 空间生产与共同体生成——以上海市 G 社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 68–82.
马丹, 袁浩. (2018). 城市社区中居委会与业委会关系对社区认同的影响——以上海 546 个小区为例. *社会工作与管理*, (4), 60–65+96.
潘孝富, 何立冬, 陈澔文, 曹坚, 王芸. (2022). 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 社区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与邻里关系的调节作用. *社区心理学研究*, 14, 21–36.
曲映蓓, 辛自强. (2017). 影响发声法的设计思路及在心理学中的应用. *心理技术与应用, 5*(8), 493–499.
孙淑亭, 徐苏斌, 青木信夫. (2022). 工业用地转型中遗产社区认同研究. *中国文化遗产*, (3), 41–48.
唐有财, 胡兵. (2016). 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国家认同与社区认同的双重驱动.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63–69.
汪丽, 张拓, 胡玲玲. (2021). "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灵宝市 Y 村为例. *热带地理,* (5), 1034–1045.
王晓岑. (2016). 多民族社区的社区认同与族群认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大学.
王艳丽, 陈红, 杨超, 胡小勇. (2019). 社区认同: 心理学视角下的前因后果.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6), 1287–1290.
王艳丽, 胡小勇, 王康. (2023). 居民社会阶层和主观幸福感: 社区认同和控制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1*(4),1003–1006+1012.
王艳丽, 宗凡誉, 王斌. (2023). 社区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社区心理学研究, 15*, 64–79.
王永桂. (2017).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调查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67–73.
吴洪翔. (2023). 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社区认同与生活适应: 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硕士学位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
吴群刚, 孙志祥. (2011). *中国式社区治理: 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吴文峰, 吴洪翔, 吴汶蔚, 李大林, 卢永彪. (2024). 社区参与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社区认同的纵向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2*(4), 784–788.
颜玉凡, 叶南客. (2019). 认同与参与——城市居民的社区公共文化生活逻辑研究. *社会学研究,* (2), 147–170+245.
辛自强. (2015). 社区心理现状与建设思路: 基于对北京市 G 街道的调研.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4), 99–104.
辛自强. (2016). 心理建设: 社区治理新方向. *人民论坛*, (27), 68–69.
辛自强. (2020). *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辛自强, 凌喜欢. (2015). 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 概念、测量及相关因素. *心理研究*, (5), 64–72.
杨之旭, 辛自强. (2016). 应用心理学中的个体指向方法: 理论、技术与挑战. *心理技术与应用, 4*(12), 744–762.
郑建君, 刘静. (2021). 公众村社认同、秩序感知对政府信任的跨层次影响.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5), 52–59.

郑建君, 马璇. (2021).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公共行政评论,* (2), 135–153+231–232.

周骥腾, 付堉琪. (2021).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居民社区融入？——基于“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调查”的分析. *社会学评论*, (5), 105–121.

周骥腾. (2021). 住房产权差异与社区认同分化——基于“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调查”数据的分析.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31–45.

Brodsky, A. E., & Marx, C. M. (2001). Layers of identity: Multiple psychological senses of community within a community setting.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9*(2), 161–178.

Chavis, D. M., Hogge, J. H., McMillan, D. W., & Wandersman, A.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through Brunswik's lens: A first look.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 24–40.

Chipuer, H. M., & Pretty, G. M. H. (1999). A review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Current uses, factor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7*(6), 643–658.

Deng, X. S., Wei, Z. Y., Lu, H., & Luo, Y. (2024). Link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mmunity identit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oneliness. *Environment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6104.

Erol, A. M., & Gormez, K. (2025). Fragmentation i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comparison in housing estate and single-family housing residential area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pat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 Planning Assessment, 13*(1), 279–302.

Fan, Y. Y. (2024). Community identity as an indicator of quality of life: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test.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9*(3),1251–1270.

Fleury-Bahi, G., Félonneau, M. L., & Marchand, D. (2008). Processes of place identification and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0*(5), 669–682.

Long, D. A., & Perkins, D. D. (200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and development of a brief SCI.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3), 279–296.

Mao, Y. H., Peng, C. Y., Liang, Y., Yuan, G. P., Ma, J. H., & Bonaiuto, M. (2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PREQ) and community identity: Flow and social capital as medi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3*, 771–797.

McMillan, D. W., & Chavis, D. M.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 6–23.

McNamara, N., Stevenson, C., & Muldoon, O. T. (2013). Community identity as resource and context: A mixed method investigation of coping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a disadvantaged commun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43*(5), 393–403.

Perkins, D. D., Florin P, Rich R C, Wandersman, A., & Chavis, D. M. (1990). Participation and the social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residential blocks: Crime and community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8*(1), 83–115.

Puddifoot, J. E. (1995).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ident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5), 357–370.

Puddifoot, J. E. (1996). Some initi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measurement of community ident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4*(4), 327–336.

Wakefield, J. R. H., Bowe, M., & Kellezi, B. (2022). Who helps and why? A longitudinal exploration of volunteer role identity, between- group closeness, and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as predictors of coordinated helping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1*, 907–923.

Wang, Y. L., Hu, X. Y., & Yang, C. (2023).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mmunity ident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ommunity resident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9(8), 13591053231206675.

Wang, Y. L., Yang, C., Hu, X. Y., & Chen, H. (2021). Community identity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in Chinese resident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1*, 26–38.

Wang, X. K., Yang, Z. X., Xin, Z. Q., Wu, Y. T. N., & Qi, S. S. (2022). Community identity profiles and COVID-19-relat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2*(3), 398–410.

Wang, Y. L., Yang, C., Zhang, Y. C., & Hu, X. Y. (2021).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s of community identity and perceived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9), 10308.

Wu, W. F., Li, D. L., Jiao, T., Wu, W. W., Wu, H. X., & Lu, Y. B. (2024). The dynamic interactiv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identity, being accepted by other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relocated residen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Cities,150,* 105080.

Xin, Z. Q., Yang, Z. X., & Ling, X. H. (2017).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matters in the community context: Relationships of self-construal with community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5*, 1050–1064.

Yang, Z. X., & Xin, Z. Q. (2016). Community identity increases urban residents' in-group emergency helping inten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6*(6), 467–480.

Yang, C., Wang, Y. L., Hall, B. J., & Chen, H. (2020). Sense of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in Chinese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mmunity identity. *Current Psychology, 39*(6), 1999–2009.

A decade 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community identity research in China

CHI Liping[1], XIN Ziqiang[2]

（1. *School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identity is the core element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and is considered a two-dimensional structure comprising functional identity and emotional identity. Functional identity refers to residents' satisfaction and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functions, while emotional identity refers to their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decade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wo-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community identity and its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 tools, scholars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in China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ntecedents (including resident and community factors) and consequences of community identity.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suffer from limitations such as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a lack of methodological diversity. Moving forward, we should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generation of community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ed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s and the "mutual embedding" between residents and

the community.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temporal changes in community identity and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s of factors at both the resident and community levels. Addition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identity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 advancing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 experiments and action research grounded in local knowledge.

Keywords: Community identity,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